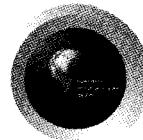


领导干部参考译丛



民主与现代化

Демократия 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ызовах XXI века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В. Л. Иноземцев)◎主编
徐向梅 等◎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现代化:有关 21 世纪挑战的争论/(俄罗斯)伊诺泽姆采夫主编;徐向梅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ISBN 978 - 7 - 5117 - 0821 - 2

I. ①民…

II. ①伊… ②徐…

III. ①民主 - 文集

IV. ①D08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981 号

民主与现代化:有关 21 世纪挑战的争论

出版人 和 龚

策划人 邢艳琦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 址 www.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录

中译本序言	[中国] 俞可平/1
导 言	[俄]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1
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全球政策论坛”上的讲话	[俄]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6

第一部分 民主的一般理论

民主与权利：当代大难题	[美] 丹尼尔·贝尔/3
民主作为幻想、理想与现实	[英] 约翰·邓恩/15
“自然边界”有“普遍价值”吗?	[俄]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26
从广场到市场：由此走向何方?	[英] 齐格蒙特·鲍曼/39
推翻专制的多数不是简单的任务	[俄] 马克·乌尔诺夫/54

第二部分 民主化实践及其特点

从 19 世纪的民主制走向 21 世纪的民主制：下一步如何？

- [俄] 阿列克谢·米勒/71
民主的苦涩胜利 [法] 多米尼克·莫瓦希/82
民主在中国：挑战还是机遇？ [中国] 俞可平/94
民主及其在俄罗斯的运用 [俄]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102
民主和不满 [保加利亚] 伊万·克拉斯特夫/116

第三部分 民主与现代化

- 现代化与民主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131
从后苏联国家转型看民主化和现代化 [俄] 安德烈·里亚博夫/155
民主或效率：21 世纪的挑战 [美] 帕拉格·卡纳/169
在现代化之路上从专制到民主：相同和特殊
..... [俄] 维克托·克拉西利希科夫/180
论市场国家与后民主 [英] 艾德里安·帕布斯特/194

第四部分 民主在世界

- 更少就是更多：政策最小主义的道德优势 [美] 阿米泰·埃兹奥尼/219
全球民主：21 世纪的一大挑战 [意] 丹尼尔·阿基布吉/236
有限主权时代的民主 [俄] 叶卡捷琳娜·库兹涅佐娃/249
全球民主与国际民主促进的新讨论 [美] 托马斯·卡罗瑟斯/261

译后记 [中国] 徐向梅/274

推翻专制的多数不是简单的任务

〔俄〕马克·乌尔诺夫*

在目前情况下，民主转型涉及一个很狭窄的方面：专制综合征这类转型社会的文化因素是对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威胁，这非常重要。

我这里说的民主转型，指的是社会从任何类型的专制制度^①转变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基础是政治精英以获得权力和影响力为目的来争取选票而进行的制度化的和公开的竞争。熊彼特把自由民主制描述成“争取领导权的竞争”或“争取自由公民选票的自由竞争”。^②

实际上，专制综合征程度不同地表现在所有走上民主化道路国家的文化中，并且让这些国家的民主化之路更曲折。而在民主转型的理论中，与经济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相比，一般文化问题，尤其是专制综合征问题都不是研究的兴趣重点所在。

* 马克·乌尔诺夫（Марк Урнов）——俄罗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经济学副博士，政治学博士，1994—1996年任俄联邦总统分析局局长，高等经济学院应用政治学系主任（2004年起）和导师（2010年起），“开放论坛”社会俱乐部协调人。有多部专著或合著，包括：《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数量和质量评估》（2000）、《当代俄罗斯：挑战与应对》（2004），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300多篇。

① 一般来说，这样的制度可以分为“传统的”威权专制和极权专制。参见 Самюэль Хантингтон（Samuel Huntington），*Третья волн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cc. 22–23（亨廷顿：《第三波》俄文版）。

② 参见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4, p. 271。

这种情况看起来很奇怪。在各种社会系统论和行为理论^①中，文化一直都有着重要的独立地位。在极权主义和民主理论中的情况差不多：在极权理论中，从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1941）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权威人格》（1950）开始，在民主思想中，至少是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1963）问世以来，文化都有独立的地位。

而在转型学中，情况完全不同。一些系统的转型学研究一般都不涉及文化问题。^②有一些著作把文化主要解释为从属于经济因素、社会结构等的现象^③，而且这种看法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有时，这种看法会出现更复杂和恰当的解释：文化尽管处于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力之下，但也能够决定新出现的政治制度的特征^④，能为破坏尚不稳定的民主制度推波助澜^⑤，

^① 参见 Талкотт Парсонс (Talcott Parsons), *О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ах*,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2; Роберт Мертон (Robert King Merton), *Соци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осква: ACT, 2006; Дэвид Макклелланд (David C. McClelland), *Мотивация человека*, СПб.: Питер, 2007; Гарри Триандис (Triandis Harry), *Культур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ФОРУМ, 2007;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Newbury Park (Ca.),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4; Shalom H. Schwartz and W. Bilsky, "Toward A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3, No. 3, 1987, pp. 550–562 и др.

^② 参见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in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2, 1997, pp. 155–183; Адам Преворский (Adam Przeworski),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рын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③ 参见 Seymour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pp. 69–105; Mancur Olson, "Rapid Growth as a Destabilizing Force",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No. 4, 1963, pp. 529–552;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 2003.

^④ 参见 Ronald Inglehart and W. E. Baker,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Vol. 65, No. 1, pp. 19–51; Ronald Inglehart,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in *Political Sciences and Politics*, Vol. 36, No. 1, 2003, pp. 51–37.

^⑤ 参见 Самюэль Хантингтон,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等等。

但是，认为文化是独立的转型要素，能对民主化命运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看法并不是很普遍。支持这种看法的最著名的学者当属罗伯特·达尔了^①，但是，他在分析多头政治的确立时，对文化的关注也比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进程的关注少得多，而且他在说文化时也十分谨慎。

我认为，应该把文化、经济、工艺、社会结构和政治看做民主转型过程中各种彼此关联和影响并相对独立的要素组成的体系。在每一这样的时刻，文化都在约束着个人、团体和整个社会可能的决策和行为。我说的文化，指的是该社会中存在的个体文化（personal cultures）的总和，其中每个文化都是主观思想、价值观、立场和模式的集合。^②

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文化或集体文化（collective culture），是规范性认识的总和，是周期性诉求的对象，个体文化与此不同，它直接调节人的行为。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说，集体文化起着类似于超我（super ego）的作用，而个体文化起的是自我（ego）的作用。

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中个体文化的总和比集体文化有更大的异质性和内容的“多变性”，即能更快地改变其价值和思想。^③ 在转型社会，

^① 参见 Роберт Даль (Robert Alan Dahl),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ее критик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с. 399.

^② 关于个体文化的思想，参见 Ronald Fischer, “Congruence and Functions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Values: Do My Values Reflect My Culture’s Value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2, Issue 11, 2006, pp. 1419–1431; Jaan Valsiner, “Personal Culture and Conduct of Value”, in *Journal of Social,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 No. 2, 2007, pp. 59–65;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Юр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культуро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Добросвет, 2000。

^③ 要构建个体文化多变性的理论模式，可以利用认同理论中常使用的稳定性这个概念（salience）。谢尔登·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和伯克·皮特（Burke Peter）定义的认同稳定性是，“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或不同人在相似环境中的行为表现出认同的可能性[的程度]”。参见 Sheldon Stryker and Peter Burk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3, No. 4, 2000, p. 286。理查德·塞尔斯（Richard Serpe）和谢尔登·斯特赖克认为，当人们找不到高稳定性认同的行为方式或无法使用这种方式时，认同稳定性的程度会变化。参见 Richard Serpe and Sheldon Stryker,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Edward Lawer and Barry Markovsky (ed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A Research Annual 1987*,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7, pp. 41–66——引自 Sheldon Stryker and Peter Burk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pp. 286–287。

文化的多变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类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怨恨^①增多等现象，或者相反的现象，“全民接受”新价值和告别过去，都属于个体文化范畴。

我现在要明确说明一下专制综合征的几个意见。在刚提到的西奥多·阿多诺的书出版后 60 年的时间内，专制综合征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纯心理学的解读到文化学的解释，不仅包含了专制人格的典型心理特征，还包含价值、思想取向，以及日常行为和政治行为的模式。不仅形成了对法律的认识，也形成了对左倾专制主义的认识。^②

对专制综合征的大量经验研究，都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专制综合征这种现象的基本内容，在各种文化环境中大多是不变的。^③ 我们在这里不研究专制综合征的所有内容，只看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对权力的态度。各种情况表明，这种态度是绝大多数专制制度国家所特有的——苏联，欧洲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佛朗哥西班牙的殖民地和同时期拉丁美洲的左派专政，虽然表现程度不同。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专制对权力的态度就是愿意把权力载体当做“父亲”或“老大哥”，这些人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比其他人“更加平等”。这是最温和的说法，它一边发展一边强化，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当权者就是最优秀的人，是国家、世界无产阶级或全人类的领袖，是神在地球上的代表，等等。^④

显然，专制体制下，很难把政权机关看做是雇佣经理人机制，更不要奢

^① 马克斯·舍勒说，“怨恨是心灵的自我毒害”，是“报复冲动、仇恨、妒忌及其他表现形式与无能为力之间的紧张冲突”造成的持久感受。参见 Макс Шелер (Max Scheler), *Ресентимент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оралей*, СПб. : Наука, 1999, сс. 13, 49。舍勒认为，“怨恨生长的土壤，首先就是那些尊严被冒犯了的人。”（同上, с. 18）

^② 汉斯·艾森克是最早描述了左倾专制主义现象的人之一。参见 Ганс Айзенк (Hans Jürgen Eysenck), *Парадок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9, сс. 246–286

^③ 或许这是因为，专制综合征活跃的心理机制（为了传统的或伪传统的家长式关系，放弃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有其内在的理由和外在的诱因）和满足放弃自由这个要求所需的组织条件，在各种文化中是不变的。

^④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建议读者可以自己评价一下，1924 年冬天举着标语“列宁墓——人类的摇篮”经过刚建成的列宁墓的农民对列宁的态度。

望会有自由主义文化中重要的“对权力的合理蔑视”^①。显而易见的是，专制的态度越强，分权制衡、权力透明、制度化冲突、政治竞争，当然还有政治参与等概念，就越难保持。这些概念，多半会被当做没意义因而也就没用的思想，或者被当做反价值来看待。

专制文化更显著的特征是：权力自然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社会与政权、领袖与人民团结一致；不准有公开的冲突^②；每个人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掌权者——掌管权力，普通公民——诚实工作，等等。

在用价值和概念等术语描述专制综合征时，我们不能忘记，它们只是文化这个冰山的顶部。冰山的水下部分是与价值和概念相关联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很难用语言表达，但对理解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制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专制综合征对民主转型的威胁表现可能各有不同，这首先取决于其强度和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其次取决于民主转型的特点。第一个因素是很明显的，而第二个就需要作一些说明。

民主化（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是社会体系极大复杂化的过程，总会导致社会中的创新分子与保守分子之间的文化冲突。这个冲突必然会把精英牵扯进来。绝对自下而上和绝对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模式都不符合现实。精英与社会其他人总是相互作用的。但是，成功的民主化对精英的文化状况和社会整体文化状况的“要求”，因转型方式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而在很大范围内有所变化。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说，经济自由化的“非既定政治结果”^③ 是“不苛求文化的”转型。这样的自由化开始于与政治家的自由主义

^① 参见 Фридрих Хайек (Friedrich Hayek), *Дорога к рабству*,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5, с. 152。

^② 在这里要提一下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援引的杜贝尔特将军的话，将军用富有特色的语言概括了 19 世纪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大大不同于我们时代的其他专制制度，它派头十足并深信自身的合法性：“在法国，政府与各党派水火不相容，而各党派也任意诋毁政府；可我们不同，我们的政府像慈父，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 *Былое и думы Кн. 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сс. 382–383。

^③ 参见 Фарид Закария, *Будущее свободы*, с. 82.

民主理想相距甚远的实用想法，不过它引起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会逐渐带来（或者不会带来）对民主化有利的社会文化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专制综合征在经济自由化开始时就不会给正在到来的民主化造成什么政治上的威胁。政治民主制度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在社会习惯了新的生活环境几十年后，也就是随着专制主义价值观、观念和模式在社会文化中失去（如果能失去）主导地位而出现的。

社会精英也不必从最开始就掌握彻底的自由主义价值和观念，不需要在价值层面上接受经济中的自由主义创新（只要这些创新在文化可以接受的范围就足够了）。所以，精英们可以允许有使自我意识缓慢民主化这种“过分之举”。我认为，不苛求文化正是这种民主化最容易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经济的“前奏”就开始民主化，如果直接从政治制度改革开始，那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民主转型起步时，社会文化在自由主义价值和观念上至少是很不发达的，而且专制综合征还有很大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要成功开始民主化，就必须适度削弱专制综合征。

在这种情况下要成功实现民主化，对改革精英的要求就更多了：深谙民主价值观，能与思想上的对手谈判，对很可能出现的社会怨恨浪潮有抵抗力，了解导致怨恨的各种情况，善于缓和怨恨。一句话，精英需要智慧、知识和经验，而这些，精英们大都无处可得。

因此毫不奇怪，在这种民主化的情况下，民主力量遭到失败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破坏尚不稳固的民主制度的方式可能各有不同。

破坏可能进行得很缓慢，途径是使各种专制做法慢慢地渗入到形式上是民主制度的日常运作中。比如，扩大对政治竞争、媒体自由和司法系统独立的各种限制，将专制作风普及到政治制度的内部和公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将那些不适应这一风格的人排挤出权力机关，提高宣扬专制口号的政治家的受欢迎度，等等。

结果就是，民主制度重新变成了专制制度。过一段时间后，这些变化用

法律和其他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其实，这就是 21 世纪初俄罗斯所发生的事。^① 如果人民积极地或消极地支持政变，或把权力民主地交给那些宣称其政治目标是反对“各种假民主”的人，推翻民主制度，有时也发生得非常快。但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速度放弃民主，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大规模出现从马克斯·舍勒时代以来政治学中所说的怨恨浪潮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末西班牙和其后拉丁美洲政治实践中显露出的“幻灭”（“el desencanto”）^② 感。

在处于民主转型过程的社会中，怨恨的主要内容是专制综合征的活跃，即与民主化开始时相比专制综合征加强了，专制综合征的种种表现变成了文化的主导特征。换句话说，这是在价值、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层面脱离民主的浪潮。

某种力量的怨恨，几乎是民主转型的共有特征。在“第三波”民主化波及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人民狂热欢迎最初的民主化措施的国家（苏联、西班牙、葡萄牙等），怨恨都在增加。

专制综合征加重的原因有许多：幻想和希望破灭，政权低效，社会不平等增加，腐败，物质生活条件和地位恶化，习惯的日常生活受到损害，必须适应新的、不熟悉的和更复杂的情况等。对局势的不满增加，推动这些因素加重了专制综合征。根据释放不满的原理，这大部分现象都属于导致挫败的因素，即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遇到的人们希望绕过或克服的那些障碍。

在现代性文化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中（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经济增长可能成为带来严重挫败的原因。

在这些社会中，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挫败效果主要由两个因素引起。其中一个因素是，实际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平等增加，加剧了社会的嫉妒心理。这个现象不仅在转型社会中有，在稳定的现代文化，甚至在后现代文化的社会

^① 关于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转型，详见 Макс Урнов и Валерия Касама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ызовы и ответы*, Москва: ФАП "Экспертиза", 2005, сс. 25–44; Марк Урно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Росси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Юрий Красин (ре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фед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сс. 87–103。

^② 参见 Самюэль Хантингтон,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сс. 275–277。

中都可以看到。另一个因素，是开始现代化的社会特有的，这就是虚妄抱负^①的倾向，所以产生这种倾向，是因为这些社会典型的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首先是像现实的目标设定这样的行为特征不够发达。^②

虚妄抱负倾向在发展中的表现是，在经济增长期，随着成功度的提升（如收入增加），虚妄抱负的增长就大大高于合理的预期。而当想有与能有之间的差距拉大^③，便产生了挫败感，结果导致攻击性和不满。在经济下滑时，社会中的抱负水平则会严重下降，抱负与预期之间的差异缩小，挫败感也减弱。在这方面，这样的社会不同于发达的现代主义文化，更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社会，在这里经济增长是降低挫败感的因素，经济下滑则是引起挫

^① 这个词是法国社会学家弗·洛贝在1957年引入的。参见 Francine Robaye, *Niveaux d'aspiration et d'expecta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7。

^② 关于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行为特征，参见 Марк Урнов, *Эмоци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8。关于现实的目标设定，参见 W. Garry Runcima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Aldershot: Gregg Revivals, 1993, p. 27; Курт Левин, *Разреш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СПб.: Речь, 2000, с. 253; Абрахам Маслоу, *Мотивация и личность*, СПб.: Евразия, 1999, с. 73。关于现实的目标设定与动机实现的成熟水平之间的联系，参见 John W. Atkinson, “Motivational Determinants of Risk-taking Behavior”,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4, No. 6, Part 1, 1957, pp. 359–372。

^③ 遵循严格的理论要求，提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想有与能有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想有与既有的差距。因为大多数关于攻击性的著名政治心理模式都用“我想有的”与“我已得到的”之间的差距，来解释社会攻击性的增加。参见 James Davies, “Toward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No. 1, 1962, pp. 5–19; Ted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0; Morton Deutsch, “Fiel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Vol. 1, London: Addison-Wesley, 1968, pp. 412–487。但是，对攻击性的这种解释，内在地要求政治人 (*homo politicus*) 具有最原始的行为模式。假定，在任何想有与既有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差距的情况下，不论在追求想有的道路上是否有障碍，政治人都倾向于攻击。此外，这个解释与心理学中对挫败的理解是矛盾的，会导致挫败这个概念与“相对丧失”概念的混淆。把攻击性发展看做是“我想有的”与“我认为能得到的”之间差距产生的一个从属现象，就没有这些缺点。详见 Марк Урнов, *Эмоци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8。

败感的因素。^①

我们说过，怨恨浪潮是绝大多数转型社会都有的，但是，这种浪潮的力度在各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之所以有这些区别，是因为有些国家的文化中具有反怨恨成分，有些国家的文化中则没有这样的成分。

对成功民主社会的认同就是这样的文化成分。在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个因素的影响是很容易看到的。这些国家在极权统治时期对民主的西方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归属感，在苏联帝国垮台时仍然是文化中的主导因素。对西方的认同感和在制度上强化认同感的努力，是东欧国家民主化的一个主要诱因。如果我们认为，努力重归西方对它们来说，是与恢复民族独立一样重要的民主化因素，这应该是不会错的。随着转型过程和由此产生的问题的发展，亲西方的定位大大缓和了国内的怨恨，阻止了专制主义报复的可能性。

在苏联和后苏联的俄罗斯，亲西方的定位也起过并正在起着阻止专制综合征的作用。大多数的社会调查表明，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西方主义”与民主价值紧密相连，而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其他把俄罗斯与西方对立起来的形式，都对应着各种专制综合征的因素。

但是，西方主义在俄罗斯不如在东欧国家盛行，而且有些不同的特点，大部分亲西方的人，认为俄罗斯与其说是西方的一部分，不如说是西方的伙伴。俄罗斯文化中西方主义相对薄弱的原因是，这种思想一直以来与强国思想对立，俄罗斯人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是独立的世界游戏者，它令人害怕，被人尊重^②，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不希望看到俄罗斯是某个社会平等的一分子。

^① 关于经济增长条件下挫败感的增长和经济危机时挫败感的减轻，详见 Марк Урнов, *Эмоци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8。这里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几个例子，在现代化较早阶段，经济增长时就加剧了挫败感和社会紧张情绪，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希腊，60 年代的西班牙，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的巴西，60—80 年代的台湾和韩国，80 年代的伊朗和中国。参见 Самюэль Хантингтон,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сс. 82—84。

^② 我在 2004 年对“俄罗斯大众意识中的极端专制综合征”的研究显示，60% 的受访者同意这种说法：“其他国家应该害怕俄罗斯，并因此尊重俄罗斯。”参见 Марк Урнов и Валерия Касама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ызовы и ответы*, с. 54。

强国思想是至少两百多年来俄罗斯同一性中的一个不变的内容。^① 在 19 世纪，俄罗斯文化中的强国思想与反西方主义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历史发展中，反西方主义作为强国思想的一个补充因素，其强度稳定增加。苏联时期，达到了顶点，戈尔巴乔夫试图把俄罗斯文化的这两个组成因素结合起来，众所周知，以失败告终。

在当代俄罗斯文化中，强国思想与反西方主义之间还保持着正相关性。今天还像过去一样，俄罗斯文化中亲西方的方针与强国思想玩着“零和游戏”，强国思想的普及范围越广，西方主义就越不受欢迎，反之亦然。今天俄罗斯强国情绪增长，带有强烈的反西方倾向，这不是偶然的。^②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数据，在 1995—2007 年间，受访的俄罗斯人中，对提到美国持肯定态度的比例从 77% 下降到了 37%，而对提到美国感到不愉快的人，从 9% 增加到了 40%。在俄罗斯，西欧的形象也在下降，在 2002—2007 年间，受访者提到西欧的负面特点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从 37% 增加到了 45%。在负面特点中增长最大的有：“压迫”从 19% 增加到 34%， “威胁”从 43% 增加到 57%， “软弱”从 12% 增加到 25%， “道德颓丧”从 33% 到 45%， “危机”从 14% 到 24%。^③

文化中存在的能缓和怨恨的因素，使改革精英们的民主转型过程明显变容易了。

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或者这些因素很不明显，民主精英们就应想办法建立一些缓和机制，尤其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专制文化转型为民主文化（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就论述过有意培养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于发展和践行民主的

^① 20 世纪俄罗斯历史上有两个短暂时期（每个时期大约十年），强国思想不受欢迎：一个是从 1917 年到 20 年代中期，另一个是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这两次“非典型的”情绪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并以不同方式表现在政治实践中，但是这样的时期都被强国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强大浪潮取代了。

^② 这些情绪的表现有间接的标志，那就是在俄罗斯民众和精英的意识中，不能以健康的心态自我嘲讽这种对国家强大的全民关注心态。结果，强国热情有时就十分可笑地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货架上摆放的熏肠名为“帝国”牌。

^③ 参见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осква, 2007。

特殊作用，当然，他们用的不是这些词)^①。

许多年过去后，1944 年，20 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库尔特·勒温写道，必须系统地改造德国纳粹制度所形成的文化。^②

我认为，对转型社会进行文化“重组”的措施至少应包括：

——有针对性地摧毁专制文化的神话、价值观、观念和模式，借助电子媒体、互联网、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推动自由主义文化的普及（给社会“注入自由主义”）；

——向各级权力机构的代表普及民主管理的方法（勒温认为这是从极权文化向民主文化转变的首要措施^③）；

——国家扶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民主实践；

——通过国家政策，提高（至少要支持）对文化转型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文艺和科学知识分子、记者）的社会地位，最广泛地吸收这些团体的代表与政权合作。

当然，上述措施不能保证不产生怨恨浪潮，但完全可以降低怨恨的程度。

许多自由主义改革家都对文化转型思想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或者否认这种思想。^④ 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世界观反对国家以任何形式干预个人的选择。

前面提到的文化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从属现象，是这一立场的实用基础。这种看法在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表现是，认定发展中产阶级是民主变革不可逆转的最好保障。许多人认为，中产阶级有各种价值体系，凭借其价值

^① 孟德斯鸠说，“共和政体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参见 Шарль-Луи де Секонда, барон Ля Брэд и де Монтескье, *О духе законов*,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9, с. 39。托克维尔写道，“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教导人们民主，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理想，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使公民逐步参与管理国家，防止经验的不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民主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任凭其野蛮的本能去支配”。(Алексис де Токвиль,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Америк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2, с. 30.)

^② 参见 Курт Левин, *Разреш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с. 160–196。

^③ 参见 Курт Левин, *Разреш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с. 171。

^④ 他们在这方面与极权主义改革家不同。极权主义改革家非常重视文化在保持政治制度稳定方面的作用，在获得或夺取政权后，立刻就开始实施某种形式的“文化革命”。

体系，就可以同样成功地或者成为民主制度的支柱或者成为专制制度的支柱^①，而这个观点一般未受到注意。

无论怎样解释低估民主化的文化因素的原因，都不为过。所以就不能不同意勒温的观点，勒温说，“民主领袖想要小团体气氛民主点，他就应该拥有权力，应该利用权力进行积极的再培训”，“对周围人宽容这一民主原则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件：‘以民主的不宽容对待不宽容’^② 同样是必要的”。

说到把文化调整到民主轨道的各个方面，那么应该指出的是，调整的对象不是纯粹的专制文化，而是转型文化，它并不十分完备，其中专制综合征的各种因素有时与完全不同源的因素神奇地结合在一起。

把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来自国家的同样极端的家长式预期结合起来，是转型社会文化最常遇到的也是最危险的幻想。在日常语言中，个人主义原则和集体主义原则的杂交可以表达如下：我有权做我想做的，我对社会和国家都没有义务，不过社会和国家有义务保证我的福利。

这个“个人主义家长制”不但与成熟的专制文化不相容，而且与成熟的民主文化也不相容。但是，在正瓦解的或正确立的左派专制社会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在摆脱了左派专制制度但尚未完成民主转型的社会中也能发现它。在社会主义制度末期的苏联和后苏联的当今俄罗斯，这种个人主义家长制都很普遍。^③ 在后苏联国家、后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和当今委内瑞拉某种程度上也很普遍。

在处于民主化过程的社会里“个人主义家长制”越普遍，社会面临的选

^① 详见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27–179.

^② Курт Левин, *Реш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сс. 170, 162.

^③ 再一次引用我2004年的研究。在该项研究中，在“国家应保证每个人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水平”还是“国家应只关心那些确实无法工作的人（老人、孩子、残疾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68%的受访者更倾向第一种观点，28%的人选择第二种，4%的人表示难以回答。我在其中指出，认为国家是保护者和庇护者的观点，与对国家的深刻不信任完全可以并存。在该项研究中，72%的受访者同意“俄罗斯的大多数官员都是窃贼”的说法，大约同样数量（75%）的受访者认为，“电力、煤炭、石油工业、铁路这样的战略部门应该归国家所有”。参见 Марк Урнов и Валерия Касама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ызовы и ответы*, сс. 56, 62。

择就越具戏剧性：是放弃对个体权利和国家的社会作用的简单化认识，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还是回到比民主化尝试之前存在的制度更腐败更低效的专制制度？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家在垮掉前能经受多少不成功的民主化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状况。

(彭晓宇译 高晓惠校)

参考文献

John W. Atkinson, “Motivational Determinations of Risk-taking Behavior”,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64, No. 6, Part 1, 1957.

James Davies, “Toward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No. 1, 1962.

Morton Deutsch, “Field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Vol. 1, London: Addison-Wesley, 1968.

Ronald Fischer, “Congruence and Functions of Personal and Cultural Values: Do My Values Reflect My Culture’s Values?”, 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2, Issue 11, 2006.

Ted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0.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Newbury Park (Ca.),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84.

Ronald Inglehart,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6, No. 1, 2003.

Ronald Inglehart and W. E. Baker,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5, No. 1, 2000.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is of Politic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81.

Seymour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 1959.

Mancur Olson, “Rapid Growth as a Destabilizing Force”,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3 , No. 4 , 1963.

Adam Przeworski and Fernando Limongi,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in *World Politics* , Vol. 49 , No. 2 , 1997.

Francine Robaye, *Niveaux d'aspiration et d'expecta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57.

W. Garry Runcima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Aldershot: Gregg Revivals , 1993.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rge , Allen & Unwin , 1944.

Shalom H. Schwartz and W. Bilsky , “Toward a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 53 , No. 3 , 1987.

Richard Serpe and Sheldon Stryker,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Edward Lawer and Barry Markovsky (ed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A Research Annual 1987*,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87.

Sheldon Stryker and Peter Burk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an Identity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 Vol. 63 , No. 4 , 2000.

Jaan Valsiner, “Personal culture and conduct of value”, in *Journal of Social,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 Vol. 1 , No. 2 , 2007.

Ганс Айзенк, *Парадок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 2009.

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 *Былое и думы. Кн. I*,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1962.

Роберт Даль,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ее критик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 2003.

Фарид Закария, *Будущее свободы*, Пер. с анг. под ред. и со вступ. ст. В. Л. Иноземцева,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 2004.

Курт Левин, *Разреш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СПб. : Речь , 2000.

Дэвид Макклелланд, *Мотивация человека*, СПб. : Питер, 2007.

Абрахам Маслоу, *Мотивация и личность*, СПб. : Евразия, 1999.

Роберт Мертон, *Соци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осква: АСТ, 2006.

Шарль-Луи де Секонда, барон Ля Брэд и де Монтескье, *О духе законов*,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9.

Талкотт Парсонс, *О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истемах*,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2.

Адам Пшеворски,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рын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Юрий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Добросвет, 2000.

Алексис де Токвиль,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Америке*,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2.

Гарри Триандис, *Культур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Москва: Форум, 2007.

Марк Урно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Росси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 Юрий Красин (ре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федер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Марк Урнов, *Эмоци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оведении*,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8.

Марк Урнов и Валерия Касама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Вызовы и ответы*, Москва: ФАП «Экспертиза», 2005.

Фридрих Хайек, *Дорога к рабству*, Москва: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5.

Сэмюэль Хантингтон,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Макс Шелер, *Ресентимент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оралей*, СПб. : Наука, 1999.